

中國夷居

東亞大陸人類簡史

張經緯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秦始皇泰山石刻
(複製品，作者攝於山東省博物館。)

岷江峽谷

(自古以來就是川西高原與四川平原
的必經通道。作者攝於汶川。)





當代放牧人

(作者攝於新疆阿勒泰。)



秦長城

(現存包頭市固陽縣。)



雅魯河谷藏區第一座宮殿
——雍布拉康
(作者攝於山南澤當。)

松贊干布畫傳唐卡
(描繪松贊干布改革政體、振興軍事、發展經濟的故事。)





西漢近方形駝鈕“漢叟千長”銅印
(現藏蘆山縣博物館。)

商周採礦遺址全景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內。)





捲雲紋青銅匕首
(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現藏江西省博物館。)



吳王夫差矛
(湖北江陵馬山 5 號楚墓出土。現藏湖北省博物館。)

目錄

構建完整的人類史 / 001

第一章 東亞大陸的人文、地理志

引言 秦始皇的旅行 / 3

1.1 秦始皇的旅行（一） 3

正文 地質年代的舞台 / 8

1.2 “地理漏斗”與更大的結構 8

1.3 通道與“塞子” 13

1.4 東亞大陸的聯繫之網 16

1.5 人類的旅行 21

1.6 文化的定義及其引理 25

1.7 建立人類遷移—互動模型 28

1.8 小結：秦始皇的旅行（二） 31

第二章 地理構造與人類活動

引言 贊普的天堂 / 41

2.1 “天神下凡”：從神山降臨的贊普 41

2.2 天堂有路，洞天兩重 42

2.3 且行且徘徊，已在千里之外 45

2.4 萬壑千山，皆是通途 46

正文 吳越爭霸 / 49

2.5 三千越甲可吞吳（一） 49

2.6 三千越甲可吞吳（二） 51

2.7 干越之劍的秘密 53

2.8 吳越在齊、楚之間 56

2.9 更大的趨勢 59

2.10 小結：“太平洋板塊”南部的壓力傳遞 62

第三章 古典時代的政治經濟學

引言 楊家將往事 / 71

- 3.1 穆桂英、佘太君與楊家將 71
- 3.2 北買党項馬，西擒吐蕃鸚 72
- 3.3 平夏南山云有異，源流風俗本不殊 75
- 3.4 物質生產與文化變遷 76

正文 八駿的秘密 / 79

- 3.5 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79
- 3.6 小孟鼎：穆王傳說的另一面 83
- 3.7 八駿的秘密 85
- 3.8 由“生”到“熟”的西戎 87
- 3.9 秦與周：互動之網 89
- 3.10 秦人的契機 92
- 3.11 秦晉之好 94
- 3.12 燕趙的復仇 96
- 3.13 小結：“太平洋板塊”北部的壓力傳遞 100

第四章 人群互動與遷移動力

引言 人參和女真 / 113

- 4.1 牧圉此時猶捍禦？——重新解讀明清之際 113
- 4.2 白山黑水之間的遷移路徑 114
- 4.3 打圍放牧，縱使生理 117
- 4.4 夷得華貨即歡忭 118
- 4.5 人參、女真、山海關 121
- 4.6 “社會變遷”的基本模型 123

正文 羌在商周之間 / 128

- 4.7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 128
- 4.8 有命在天 132
- 4.9 羌在商周之間 135
- 4.10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 140
- 4.11 克東夷而隕其身 143
- 4.12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的代價 146
- 4.13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149
- 4.14 泉之竭矣：從“好利”到失利 151
- 4.15 小結：內迫於中國，延及鬼方 155

第五章 更大的互動：東亞大陸的命運（上）

引言 秦始皇的理想 / 173

5.1 秦始皇的理想 173

正文 漢武帝的選擇 / 177

5.2 最後的越人王國 177

5.3 單于的選擇（一）：致命的誘惑 181

5.4 單于的選擇（二）：交織的命運 184

5.5 武帝的品味 187

5.6 無盡的輪台 189

5.7 王莽的機會（一）：“司農錢盡” 191

5.8 王莽的機會（二）：“孝悌之心” 193

5.9 小結：西漢的黃昏 195

第六章 更大的互動：東亞大陸的命運（下）

引言 寶釧與平貴 / 205

6.1 “王寶釧與薛平貴”的兩個版本 205

6.2 隱藏的主角 207

6.3 沙陀與盛唐的兩面 209

6.4 薛平貴們的“大登殿” 212

正文 班彪的策略 / 214

6.5 班彪的策略：不勞師而幣加（一） 214

6.6 班彪的策略：不勞師而幣加（二） 216

6.7 班彪的策略：不勞師而幣加（三） 220

6.8 “振大漢之天聲”—— $Y(t)$ 曲線的頂點 222

6.9 “羌胡邊雜之師”的未來 225

6.10 北匈奴的復仇（一） 228

6.11 北匈奴的復仇（二） 231

6.12 北匈奴的復仇（三） 234

6.13 董卓們的“大登殿” 236

6.14 小結：“一夫耕，百人食之”——農業社會的發展模式 238

第七章 總結：東亞大陸人類遷移的模型

7.1	作為新起點的總結	251
7.2	東亞的齒輪	254
7.3	後有來者：東亞大陸的人類史（一）	260
7.4	前有古人：東亞大陸的人類史（二）	266
7.5	一個數學模型	273
7.6	走出三代的“迷霧”	282

附錄一 世界的“齒輪” / 308

附錄二 “國家起源”的新假設 / 323

參考文獻 / 329

後 記 / 339

構建完整的人類史

“東亞大陸的人類史”^{*}是個有趣的題目，顧名思義，這個題目基本濃縮了本書寫作的主要意圖。

在很大程度上，“東亞大陸”等價於歷史上的“中國”，但就所指的邊界的穩定性而言，前者甚於後者，因此在空間範圍中相對固定的“東亞大陸”就成為本書主題的第一個關鍵詞。

其次，東亞大陸作為一個具有漫長文獻記錄傳統的區域，在文明史上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材料；不過，這顯然不是人類在這一區域活動的全部。在擁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之前，東亞大陸的人類已經在此生息了數萬年之久，幾乎十多倍於文明史的時間範圍。忽略了更加悠久的“史前”階段來探討東亞人群的活動，或許就不會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如何將文明史之前的“史前”階段與文明史共同結合為一部“人類史”，便是本書第二個關鍵詞的目標。

一言以蔽之，本書的研究目的，就是嘗試將東亞大陸人類活動的史前部分與文明史階段合二為一。事實上，前人對東亞大陸的“歷史”早有大量研究，其中不乏皇皇巨著，且不局限於人文學科領域，比如綜合多個學科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或是以自然科學

^{*} 編者按：本書原稿書名為“四夷居中國——東亞大陸的人類史”。另，本書中所附地圖僅作示意圖之用。

研究為主的“人類基因遷移圖譜”項目（東亞部分）。不可否認，這些研究對我們理解東亞大陸人類的起源和遷移提供了重要的知識平台與認識突破，但某種致命的“鴻溝”似乎又在“史前”與“文明史”之間設置了無法逾越的障礙。

東亞大陸的人類史作為全人類歷史上遷移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顯然受到最近二十年來人類基因組研究成果的強烈影響。早在半個世紀前由古人類化石證據提出的人類“非洲起源”的考古人類學假設，最近得到分子人類學方面的有力支撐，讓這一觀點從一種假設變為了當今學術界的共識。因此，人類“非洲起源”的觀點就構成了我們理解東亞人類（史前）起源和遷移的一個直接理論基礎。正是從這一觀點中，我們獲得了早期東亞人群在以萬年為單位的時段裡，從大陸南部進入這一區域並在此繁衍、生息的基本觀念；但也同時收穫了與以往“常識”相反的看法。

相比較而言，分子人類學藉助人類遺傳信息所繪製的人類基因遷移圖譜，所涉及的時間跨度是以萬年至數十萬年計，而在人類史上較晚才出現的文明史階段，卻留下了與其時間跨度極不相稱的汗牛充棟的文獻記錄。和無任何文字信息的史前階段相比，文明史上的充足記錄的確能幫助我們彌補史前階段在大多數時候留給我們的沉默，但又由於這些記錄過於豐富（以及缺乏清晰的層次感，比如，無法區分人類遷移的短期和長期趨勢，詳見正文），在很多時候反而不及分子人類學證據來得明確、直接。

這兩種不對稱導致的一個結果，便是科學的史前史和人文主義的文明史之間的巨大鴻溝。具體來說，“非洲起源”（及建立在該研究結論之上的“東亞人群”起源）的觀點實際上是暗示了一種人類歷史上自南向北、自西向東的遷移過程；而恰好與之相反的，則是文明史上大量自北向南（如“衣冠南渡”）、自東向西（如“蒙古西征”）的人類遷移經驗。因此，這一長期數據與短期觀察表面上一

目了然的無法調和，就在我們的知識領域中產生了一種有趣而尷尬的局面：史前史與文明史之間幾乎以“文明”的出現為標誌，分為“天各一方”的兩個領域，享受着“雞犬相聞”的孤獨。

史前史與文明史的研究是否真的存在這樣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其通俗版本是：人類在舊大陸（或具體到東亞大陸）的遷移究竟是自南向北，還是自北向南（與此等價的問題，則是自西向東，還是自東向西）？雖然答案及其解答過程要經歷本書正文及最後兩篇附錄的閱讀才能給出完整結果，但不妨提前透露一下：這個鴻溝並不存在。

如何處理這兩個領域給我們留下的認知差異，就是本書所要處理的核心技術問題。平心而論，這個明顯宏大的題目似乎並不適合一本絕大部分以文獻記錄為素材的著作，尤其是在人類基因研究成果已經非常豐富且極有說服力的今天。但是，這一表面上的認知鴻溝之所以存在，原因的確不在於建立在基因研究基礎上的分子人類學結論，恰恰就在於文明史研究所依託的“過於豐富”的記錄——我們過於信賴前人對文獻記錄的經驗解讀——正由於我們本身所處東亞大陸的巨大空間區域，遮蔽了我們對可靠時空參照系的選擇，長期積累並疊加放大了短期觀察中存在的細小誤差。因此，本書實際上必須通過對以文獻記錄為代表的人文產物的分析、解讀，來實現重建文明史階段東亞大陸人群的“起源”、遷移這一科學目標，並最終溝通東亞大陸史前史與文明史之間的“鴻溝”，建立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史”。

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個由於文本經驗而積累的巨大誤差，也只有通過對文獻的重新梳理，才能最終獲得修正。因此，這本標榜“人類史”的著作，仍然在表面上會呈現某種文史研究的面貌。但是，其本質上鮮明的實證主義每每在文中流露。如果我們接受史前史和文明史之間的認知差異，緣於“觀察時段的坐標單位選擇”這

一解釋——比如，人類史研究往往動輒以萬年作為時間坐標單位，而文明史通常關注的是百年乃至更短的時段，那麼如何實現這兩類參照體系的兼容，就成為此項研究中最關鍵的方法問題。

所以，開宗明義地講，我在本書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將東亞大陸文字記載中有關人群遷移的每一條記錄，轉化為一個個獨立的數據。將時間和空間上相鄰的數據歸類，再將這些數據投射到東亞大陸實際存在的地理結構中，使相鄰數據呈現具體的相關性。通過相鄰區域中人群的互動趨勢，在已有的地理框架上加以表達，建立、繪製出人類遷移的具體路徑。同時，再利用不同時期發生在同一區域內遷移記錄的多個歷史數據，對該路徑的實際走向進行修正。通過這些工作，來確認東亞大陸人群遷移過程在某個較大區域的總體趨勢。

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幾個區域內人群遷移方向的比較，模擬出東亞大陸人群區域互動的標準模型。同時藉助不同時期歷史文獻的比對研究，探尋不同人群之間文化互動的基本法則，歸納出人類遷移的動力之源。這樣，我們就可以重現東亞大陸晚近文明史上人類的遷移歷程，達到在史前史和文明史之間構築一條“人類史”通途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書寫作目的就不同於一般的歷史類著作，其鮮明的人類學意圖一目了然：不為陳述史實，而在於把握歷史上大多數社會變遷的趨勢。

知易行難，這個研究方法的核心雖能三言兩語道出，實踐起來卻並不似這般輕鬆。首先，為了避免理論討論的冗贅和文獻梳理的蕪雜，我在全書的篇章框架中採用了一種特殊的結構。書中除第七章以外的每一章節，都分為引言和正文兩個部分，引言選取時間上相對較晚（通常為人們熟知），且與正文所述相似的人群互動“故事”，通過分析，引出正文將要討論的主題。這種可以說脫胎、化簡於明清擬話本小說的敘事結構，在幫助我們更輕鬆解讀文獻的同

時，也有意識地拓寬了正文部分有限的時間跨度，為第七章的總結部分提供更豐富的人群遷移數據。

其次，為兼顧理論和文獻，本書從第二章開始至第四章，每章既是呈現了一段先秦時期的人群遷移、互動過程，事實上也是用一段篇幅闡述一個“中層理論”，分別在從簡單到多元的不同層次上闡述人類包括遷移在內文化互動的各個維度。而第五、六兩章則是通過對這三個理論的綜合運用，全面呈現東亞大陸人類遷移的內部機制（關於這三種中層理論的內容概括，見第一章 1.7 節）。在內容方面，每一章既是全書整體的一部分，又擁有完整的獨立結構。第二至四章將以逆序的形式重建春秋、戰國以及西周（晚商）時段裡東亞大陸不同局部的人群互動，第五、六章則以秦、漢續接戰國，完成對東亞大陸早期人類遷移過程的敘述，並以此為基礎在總結部分繼續“上下而求索”。

具體來說，秦始皇會以“嚮導”的身份，在第一章中帶領我們完成對東亞大陸地理構造和人文類型的探索。第二章裡，藏地天堂的贊普將同吳、越的國王們一道“指點”我們走進文獻背後的密徑。第三章聚焦的對象分別是楊家將的原型和《穆天子傳》的主角，一種有趣的動物使他們最終走到了一起。第四章中，我們會看到人參為滿洲崛起提供的奇妙動力，而周王和他們的姜氏妻族則要在《詩經》中一同歌頌他們實現的社會變遷歷程。孟姜女在第五章會為秦始皇洗脫因修築長城所蒙受的千古罪責，而漢武帝的後人們卻未能繼承劉徹在《輪台罪己詔》中的深刻反省，為王莽的“表演”鋪好了舞台。王寶釧和薛平貴的故事或許將構成本書篇幅最長的一段引言，但這篇與眾不同的“戲考”將連同第六章正文中班氏祖孫的事跡一起，幫助我們深刻體會到生產—消費關係在農業定居社會中所起到的無與倫比的作用。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一種不容喘息的閱讀高潮將等待着跟隨我

在全書中探究東亞大陸人類史的讀者們，不論是函數工具，還是曲線圖示，都會為我們揭開“三代的迷霧”激發摧枯拉朽般的激情。至於本書最後的兩篇附錄，或許可以稱得上是留給耐心翻完本書讀者們的“彩蛋”，相信這些言簡意賅的陳述，能讓我們在探索更完整的人類史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感謝前輩學者們在“東亞大陸人類史”這一領域內作出的卓越貢獻，他們的名諱如繁星點點散佈於本書注釋、引文，便不一一再舉。我願從他們傳遞的三千弱水中，取得真知一瓢，且與讀者諸君把盞分享。

對本書的綱領性介紹，依靠上述寥寥數言，誠恐重任難堪；不過倘使這些隻言片語，能激起諸位一點探索之好奇，便請同我一道收拾行囊，攜手上路，追隨秦始皇的腳步，重走東亞大陸人類遷移之旅。

第一章

東亞大陸的人文、地理志

引言 秦始皇的旅行

1.1 秦始皇的旅行（一）

公元前 219 年，四十一歲的秦始皇開始了他有生以來最漫長的一次旅行。

其實在前一年（前 220），他就已經嘗試了一次短途旅行，“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1]。這是一次西行，秦始皇從渭河谷地的腹地出發，向西方逆渭河而上，經過其西北流向的支流汧水河谷，越過了甘肅和陝西之間的分界線隴山，來到隴（山以）西。

文獻沒有提到秦始皇在這裡做了甚麼，但作為秦國的發源地和祖居地，隴西之於秦始皇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見本書第三章正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一年前剛完成了平定天下、“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的事業，這或許可以解釋，秦始皇將隴西之行設為今後若干次旅行第一站的用意。

結束了隴西之行後，他沒有沿着原路返回，而是沿着隴山—六盤山往北，進入了位於慶陽盆地的“北地”^[2]。這裡是渭河第一大支流涇水的上游，從這裡開始，可以順着涇水河谷直達他位於涇渭之交處的宮寢——咸陽（見圖 1.1）。這次短途旅行後，秦始皇開始修馳道，並對旅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相比一年前這次嘗試，前 219 年的旅行在他的生命中佔據更重要的地位。過去十年間，他從渭河谷地與四川盆地的國王，變為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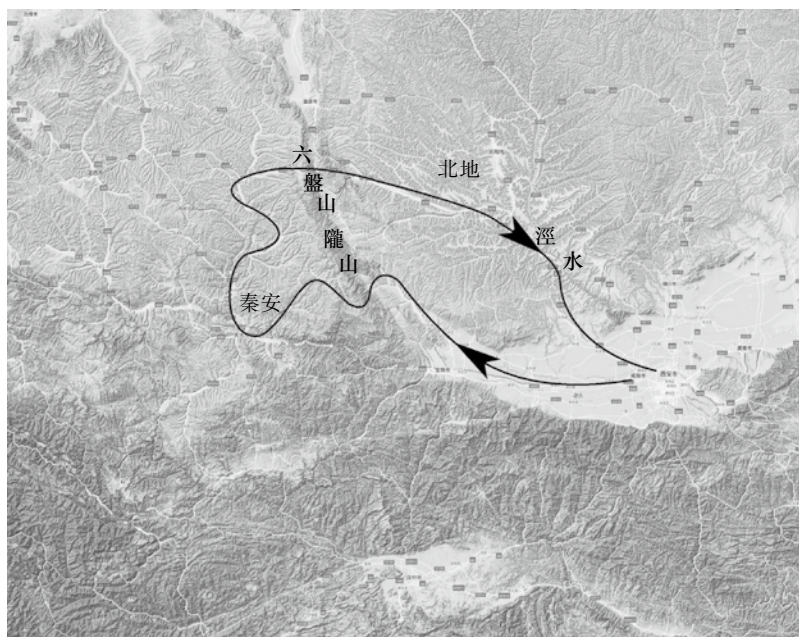


圖 1.1 公元前 220 年，秦始皇西行路線

亞大陸東部主要農產區的第一位“皇帝”。結束統一東部平原六國的征服戰爭後，他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劃分完自己的土地，給自己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名號。現在，秦始皇終於有精力也有時間，去了解一下自己征服的土地到底有多廣了。

依靠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不太盡責的記錄，我們看到前 219 年的這次旅行中，“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在泰山完成了包括立石、封禪、祠祀在內的一系列活動，沿着山東半島渤海沿岸繞了一圈（司馬遷沒有記下秦始皇穿過華北平原抵達陸地最東端的具體線路，或許可以參考之前秦將王翦伐趙的路線）。之後，他在山東半島南部的琅琊，快樂地生活了三個月——這應該是秦始皇第一次到了這麼遙遠的東方，並且第一次看到了大海，他還在這裡派遣徐福“入海求仙人”。

儘管不知道秦始皇的出發路線，但這次旅行的歸途卻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信息。他從山東半島南下彭城（徐州），向西南方向移動，渡過淮河，來到了華北平原最南部的“衡山”^[3]。到達衡山山脈標誌性的霍山後，他沿着這座東西走向的山脈北坡向西返回。從大別山和桐柏山之間的通道穿過，進入楚地，北走隨棗走廊（約在襄樊位置）入漢水溯流而上，經漢水支流丹江以及湘河河谷^[4]，進入秦嶺東端的通道。通過武關，最後是藍田，回到渭河谷地腹地（見圖 1.2）。

繼前 219 年第一次深入南方的旅行後，前 218 年秦始皇又去山東看海、刻石。這次同樣未載去路的旅行是從太行八陁中的滏口陁返回，進入上黨盆地，轉行汾水河谷從西南方向回到了咸陽。

關鍵的轉折出現在前 215 年。這一年，秦始皇來到秦皇島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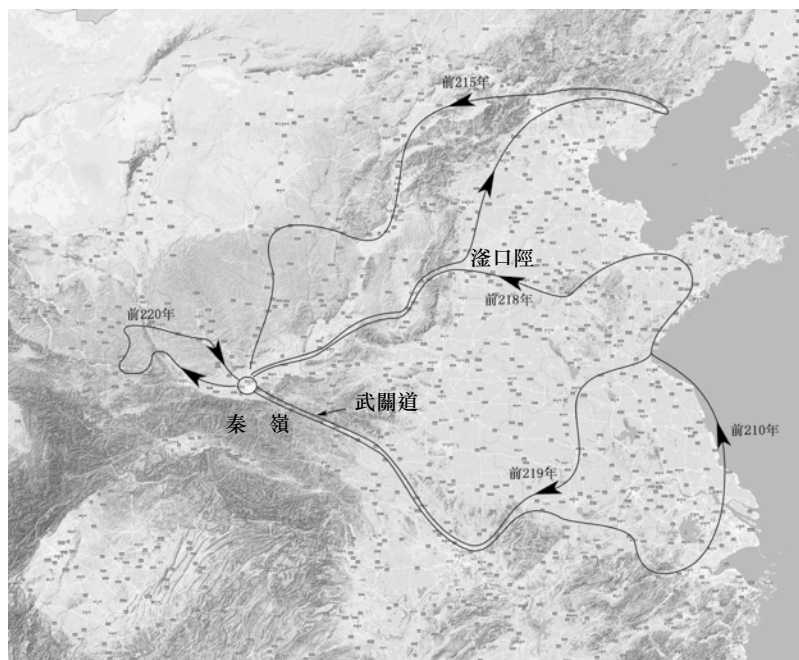


圖 1.2 秦始皇的旅行（箭頭表示該次旅行的方向，與其他路線重合的兩次未標出）

的碣石，觀海、刻石；其後的行程，司馬遷籠統地寫道：“巡北邊，從上郡入。”這次旅行，加上方士盧生的預言，對秦始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控制了河套以南的地區。隨後一年，還向洞庭湖盆地以南發兵，溯湘江越過南嶺，憑武力建立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在“西北斥逐匈奴”的同時，於前 213 年“築長城及南越地”。這些行動最終與秦代的終結產生了某種因果聯繫（見第五章引言）。

前 210 年，秦始皇開始了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南巡。從武關沿丹水進入雲夢澤，在此西祭漢水以北的九嶷山的虞舜^[5]，接着入漢水，之長江，沿着大別山一路向東，或許從蕪湖附近上岸。他登臨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從長江渡口再度上船前往山東，最後在歸途中於德州附近的平原郡去世。

我們要感謝司馬遷留下豐富的旅行記錄——雖然因他的忽視，讓我們好幾次很難把握秦始皇出發的路線。這些信息看似繁雜、重複，充滿了各種地名，但如果能將這些信息整合到一張地圖上面，就能給我們提供非常有益的內容。在揭開這些信息前，我們應該知道：首先，秦始皇是第一位有機會在相對很短時間內連續在東亞大陸旅行的人；在他之前不僅沒有人有這樣的經濟實力，也缺乏政治—軍事保障來支持個體打破政治分野造成的局限，將東亞大陸當作一個整體來觀察——他將帶領我們從全面的角度審視東亞大陸的地理構造。

其次，他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旅行。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在旅行時為了盡可能了解自己控制的領土，所以很大一部分路線是與其所控制地區的邊緣重合，比如他沒有越過“北邊”繼續向北（因為那裡有匈奴），也沒有進入會稽以南的山地（只是在此“望於南海”）；而這些路線其實又和某些看得見的（山脈、河流）和看不見的（緯度、氣候帶）地理構造相互重合——如果我們把秦始皇旅行的足跡連在

一起，將能了解他本人對自己政治影響力的認識。

第三，最重要也最容易忽視的一點，秦始皇在許多時候選擇了相同的路徑，比如他在前 219 年和前 210 年兩次南巡的起點或終點，都選擇了秦嶺東段的“武關道”這一路徑；同時這條路徑將他的政治核心（渭河谷地）與漢水流域的南郡連在了一起（曾是重要對手楚國的主要區域）。儘管理論上，兩地之間的路徑並不是唯一的，但事實上，古往今來人類的移動路線往往是固定的。這些相同的路徑顯然並非巧合，而是更大的“地理構造”預先敷設的軌跡。

假設這些為人類活動敷設軌跡的“通道”的確存在，那麼這些通道不但溝通了不同的地理區域，而且因為其超越時空變遷的穩定性，為我們把握人類活動的具體脈絡和趨勢提供了可能。接下來，本書將沿着秦始皇的足跡，通過對“地理構造”的認識，來揭示東亞大陸人類文化互動的進程。

正文 地質年代的舞台

1.2 “地理漏斗”與更大的結構

秦始皇在前 220 年最初的短暫旅行，增強了他對自己所控制的核心區域的直觀認識。他的都城咸陽位於秦嶺北坡，渭水的北岸，北面是陝北高原的南端，涇水從高原流出後在咸陽東面不遠處匯入渭水，而這個位置實際上可以視作渭水與涇水合流形成的三角洲。

從更大的角度看，該區域又屬於渭水在秦嶺和陝北高原之間沖刷形成的河谷。這條東西走向的狹長谷地承南北水分（南有秦嶺北坡降水，北有汧水、涇水、洛河這些陝北高原南下的水系），低於陝北高原平均高度。河谷較高的降水和溫度，有利於植物生長，也為人口的增長提供了遠優於周邊地區的潛力。

如果我們再把視角放得更開闊一些，就會發現，渭水河谷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空間，而是一些更大地理與生態結構的組成部分。從秦始皇前 220 年的行程來看，他顯然是沿着河谷走到了渭水的上游，但他無法繼續通過逐漸變得狹窄陡峭的渭水河谷^[6]，必須改走汧水谷地、翻越隴山進入“隴西”，沿着六盤山進入山北的固原地區——“北地”。這樣他才有機會從慶陽盆地途經涇水河谷重入渭河谷地。

現在，我們知道渭水河谷的西部界限就是六盤山—隴山山脈。六盤山北連賀蘭山，南北各與另外兩列東西走向的山脈垂直，它們

分別為“天山—祁連山—秦嶺—大別山波峰構造帶”與“阿爾泰山—陰山—泰山波峰構造帶”。換句話說，由六盤山（隴山）—賀蘭山組成的渭河谷地的西壁，事實上通過天山、祁連山、阿爾泰山將渭河谷地與歐亞大陸腹地連在了一起（見圖 1.3）。

渭河谷地東面以呂梁山為界，將其還原到地理構造中，就會發現，這條山脈只是它們所在山西高原的一部分，而山西高原又與太行山一道拱衛着陝北高原的東緣（呂梁與太行之間，還有並列南北走向的雲中山—太嶽山）。這樣兩列山脈正好將渭河谷地包裹起來。

接下來，讓我們藉助地圖全面省視一下渭河谷地在東亞大陸中的具體位置。

在這張圖中，我們發現，整個東亞大陸（中國部分）彷彿一塊巨大的棋盤格，分別被西北—東南和東北—西南數列平行山脈構造帶整齊分割。在標出“渭河谷地”位置的區域兩側，分別由西面的天山—祁連山—秦嶺—大別山波峰構造帶和東面的大興安嶺—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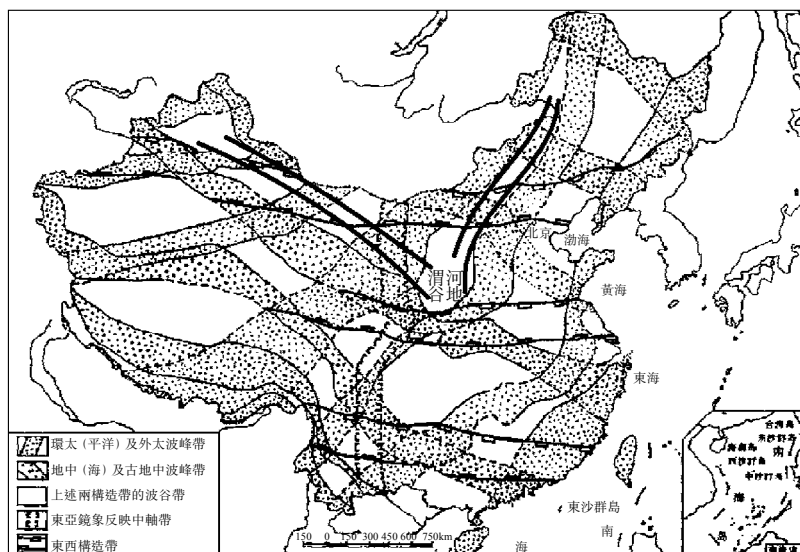


圖 1.3 中國地殼的波浪狀鑲嵌構造圖^[7]

山—龍門山波峰構造帶^[8]組成。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條交匯於渭河谷地（汾渭地塹）的構造帶，就是整個東亞大陸內部最醒目的兩條構造帶^[9]。在圖的中間，還有一條由虛線構成近乎南北方向的曲線帶，被稱作“東亞鏡像反映中軸帶”^[10]。這條連續山脈，可以描述為整個東亞大陸東西對稱構造的對稱線。

如果說圖 1.3 呈現的這一結構還不夠簡明，不妨參考一下圖 1.4 “東亞大陸構造形成簡圖”：東亞大陸的地質構造，可以基本歸納為太平洋和岡瓦納兩大構造板塊從東西兩個方向與勞亞殼塊（包括今天蒙古高原、中西伯利亞高原在內的北亞地區）的拼接^[11]。因此，我們可以把東亞大陸的基本構造形象地描述為一個如圖 1.5 這樣一個“底邊在上，以重心和三個頂點連線三等分的等邊三角形”。而秦始皇歷次旅行的起點——渭河谷地——正好就位於這個等邊三角形的重心。東亞大陸東西兩組平行山脈，就是印度洋、太平洋這兩大板塊碰撞、擠壓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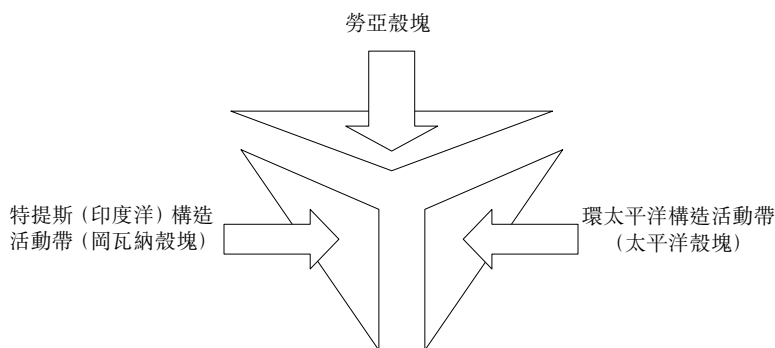


圖 1.4 東亞大陸構造形成簡圖

為了便於進一步方便說明，我們將圖 1.3 簡化成圖 1.5 “東亞大陸構造標準化模型”的形式，將整個東亞大陸表達為太平洋、印度洋和西伯利亞（地台）三個板塊的基本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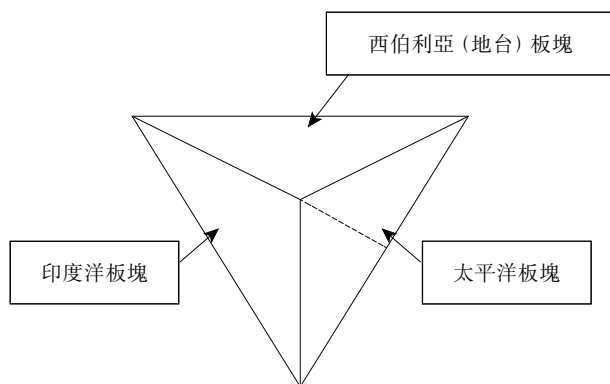


圖 1.5 東亞大陸構造標準化模型

這樣看來，祁連山脈（及六盤山—隴山）與太行山脈（包括其西部的呂梁山—恆山）就好比是一個巨大的地質結構形成的“地理漏斗”，承接着圖 1.5 中西伯利亞地台（蒙古高原）的巨大區域；而漏斗的底部就是渭河谷地（汾渭地塹），也是秦國的核心區域。雖然漏斗的上端被籠統地稱作陝北高原，但這個開放空間同樣通過黃土高原與北部的毛烏素沙地、河套地區、陰山，接入了一系列更大的地理—生態結構當中。從圖 1.3 中可見，賀蘭山—珠穆朗瑪構造帶與阿爾泰山—陰山—泰山構造帶的相交位置，也存在一個類似“渭河地理漏斗”的構造，在本書中我們也將這一構造稱作“陰山地理漏斗”（見圖 1.6）。

“陰山地理漏斗”既是東亞大陸的地質構造中心，實際上也是歐亞大陸與東亞大陸相連的一部分。它的西面是東亞大陸令人生畏的高原，只在高原周邊的河谷存在一些有限的農業空間；在其東面的大平原則是整個東亞大陸最主要的農產區。“地理漏斗”的上方，越過蒙古高原的戈壁，承受北冰洋水分的南西伯利亞地區，又是一個往往被我們忽略的人文世界。

從更大的角度省視完渭河谷地的構造地質學意義，讓我們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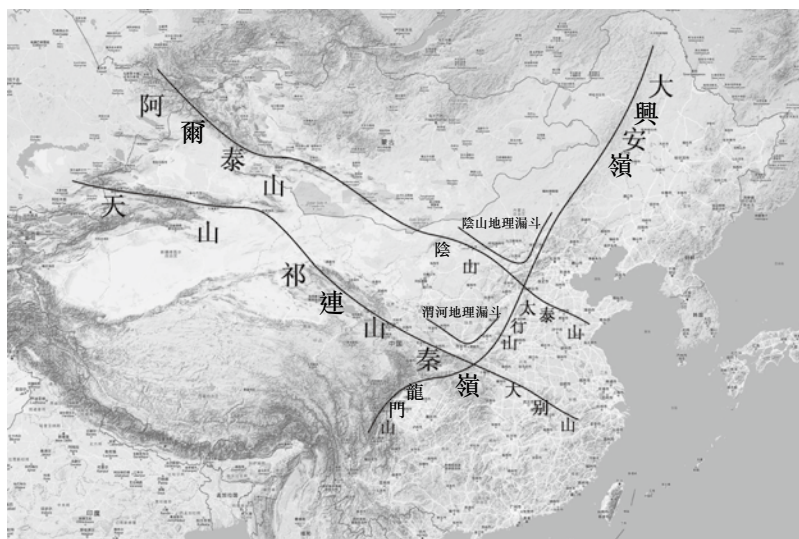


圖 1.6 “陰山地理漏斗”與“渭河地理漏斗”相對位置與形成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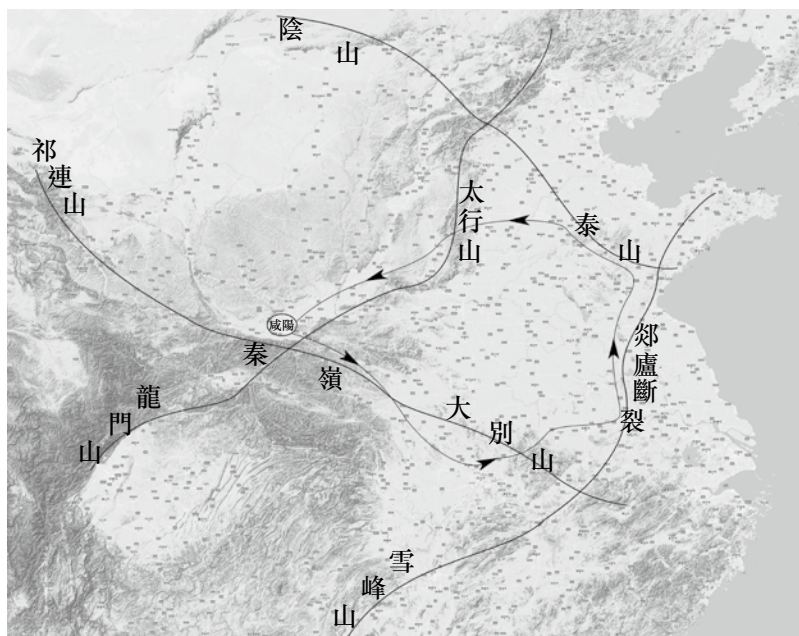


圖 1.7 秦始皇的旅行與東亞大陸構造關係圖

回到秦始皇的旅行。當我們把圖 1.2 和圖 1.3 疊加在一起時，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圖 1.7）。秦始皇的旅行，事實上非常嚴格地遵守了“中國地殼的波浪狀鑲嵌構造”。比如，他向南方的出行或歸途，基本都沿着秦嶺—大別山一線，而他在東部的旅行都沿着郟城—廬江斷裂帶^[12]進行南北移動。在山東半島又接入陰山—泰山構造帶的東端，改為東西移動；直至進入太行山，呈東北—西南方向移動返回起點。

另外，我們還發現：他的每次往來，都會經過一些固定的地點，比如出發時必要經過的武關、從南向北穿越大別山的位置，以及進入太行山的入口。這些具體的地點將啟示我們另一些值得關注的現象。

1.3 通道與“塞子”

秦始皇本人不能告訴我們答案，但我們依舊能藉助構造地質學，找到一些他選擇並遵循這些路徑的原因——我在本書中將這些路徑稱為“通道”。二維空間中兩點之間的連線有無數條，但在實踐過程中，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物都會選擇一些固定路線，秦始皇的旅行就證明了這一點。理由並不複雜，人類在悠久的歷史實踐中，早已在山脈中辨別了容易通過的峪口、谷地，並在開闊的平原上遵循水流方向和地勢起伏前行。

圖 1.3 的波浪狀鑲嵌構造顯示，在構造形成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開闊縫隙”，就成為人類往來具體區域時的“必經之路”。想要發現這些“縫隙”並不很難，古人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指示標誌，即與“通道”對應的“塞子”。在之前的描述中，這些指示標誌已經隱約現身：武關、函谷關、蕭關。既然“通道”離不開山峽、谷地，那麼人類就可以藉助人為方式控制通道的開、閉，在“縫隙”最狹窄處建造一些關卡，約束人群的通過。這些顧名思義的“要塞”在

為古人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時，也為我們今天理解地理構造的變化與聯繫給出了方向。

這樣看來，我們就有了兩個工具——“通道”與“塞子”——來理解秦始皇的旅行所具有的人類史意義。前 220 年他出發時向渭水上游前進、抵達隴西的“汧水道”（亦名“隴道”），在 20 世紀之前一直是隴西與渭河谷地往來的最主要、最直接的通道。秦始皇從北地返回渭水河谷時，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即發源於慶陽盆地的涇水河谷，這條河谷是穿過黃土高原進入渭河谷地的三條通道之一（見圖 1.8）。而秦始皇前 215 年“巡北邊”之後“從上郡入”返回時，就沿着第三條通道——洛河通道^[13]。

在定位“通道”的過程中，“塞子”也是一項重要指標。秦始皇前 219 年離開渭河谷地的去路，和前 210 年返回的路徑，都經過了一個叫“武關”的地方，從字面上可以判斷：這就是個“塞子”。當



圖 1.8 （從北部）進入渭河谷地的三條主要通道

我們把這個塞子兩端慢慢延伸，最後畫出“塞子”與區域核心之間的連線，就可以在山脈表面上複雜的層巒疊嶂中發現通道的存在。

武關位於秦嶺東段山區，在商洛與商南之間，丹江在河谷當中流過^[14]。當我們再把商洛和武關之間的連線向北延長，渭河谷地的藍田縣便出現在線上，咸陽—藍田—武關之間的路線幾乎就是一條直線。順着武關不遠，就進入了南陽—襄樊盆地的西南部，與通道並行的丹江在這裡與灌河匯合，形成著名的丹淅之間的小型沖積平原（丹淅之間的故事，也會在第二章正文提到）。

除了這條隱藏在秦嶺東緣的通道外，由潼關、函谷關將渭河谷地與華北平原聯繫在一起的主幹道就不必多言了。另外從渭河谷地向南翻越秦嶺進入四川盆地，就有經過漢中的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儻駱道，以及翻越大巴山入川的金牛道和米倉道。其中以大散關這個“塞子”為出入口的“故道”最為著名，這裡不但存在過出土了散氏盤的散國，還是五丁力士（石牛糞金）和暗度陳倉故事的發源地。

對“漏斗”來說，我們可以把它下端的通道形象地描述為“出口”，但這些通道本身其實是雙向的——既可以是出口，也可以是入口。換句話說，對於渭河谷地而言的出口，其實也是另一個區域的入口。因此，如圖 1.3 所見，當秦始皇離開位於“地理漏斗”底部的宮寢開始旅行時，他實際走過的路線，並非一時興起，而是遵循了某些自地質時代以來便已存在億萬年的路徑。對這些“通道”而言，前有古人，後有來者。

現在我們可以比較流暢地講述前 210 年秦始皇離開渭河谷地之後的經過了。他離開丹江與漢水交匯處後，進入了東亞大陸最主要兩條構造帶交匯形成的巨大盆地——南陽—襄樊盆地。他在這裡沿着大洪山與桐柏山之間的陸路“隨（州）棗（陽）走廊”向東，在麻城位置經過桐柏山—大別山之間的關隘（義陽三關），進入了黃淮

平原南部。他結束長江下游三角洲的旅行後所遵循的郟城—廬江斷裂帶，將長江下游和山東半島連在了一起。當秦始皇在華北平原東北部的德州去世前，他很可能打算再次從安陽、邯鄲之間“太行八陁”^[15]中的滏口陁返回山西高原另一邊的宮殿。滏口陁作為濁漳河流出太行山的出口，與另外七條著名通道一起構成了人類穿越太行山、往來山西高原與華北平原的主要出入口。

這些通道和塞子，不但決定了秦始皇歷次旅行的具體路線，還預設了東亞大陸各個區域之間的聯繫。那麼我們接下來要看一下，東亞大陸是如何被聯繫在一起的。

1.4 東亞大陸的聯繫之網

藉助通道觀念，我們就能揭示東亞大陸各區域之間的聯繫。“汾水道”把渭水河谷與隴西、河西，以及整個青藏高原的北邊聯繫在了一起。涇水、洛河則在連接兩個“地理漏斗”的同時，將東亞大陸的腹地與廣闊北部區域牢牢相扣。“武關道”把渭河谷地與東部數個區域緊密相連。而“金牛道”則通過漢中聯繫了渭河與四川盆地這兩個巨大的區域。

可以發現，東亞大陸被“波浪狀鑲嵌結構”分割的幾大區域之間存在着聯繫。而且，區域之間發生關聯的主要路徑一直存在，並且是固定的（就像秦始皇旅行中每次都經過武關道一樣固定）。因此，我們可以通過三個步驟畫出一幅東亞大陸的聯繫之網：第一，藉助“通道”和“塞子”，畫出區域和區域之間的聯繫；第二，依靠“波浪狀鑲嵌結構”畫出區域內部的路徑；第三，將區域內部與區域之間的路線相連。那麼，在我們用“通道”描述東亞大陸的聯繫網絡之前，先要弄清這塊大陸可以分為哪些區域，以及這些區域形成的大致原理。

現在需要再次用到圖 1.3，我們按照這種東西山脈的交叉機理，

像棋盤格一樣把東亞大陸分成如下部分（以渭河谷地為中心，逆時針螺旋曲線排列）：1. 渭河谷地；2. 四川盆地；3. 兩湖（洞庭湖南北）盆地；4. 鄱陽湖盆地；5. 黃淮海平原；6. 東北平原；7. 蒙古高原東部；8. 蒙古高原西部（及準噶爾盆地）；9. 塔里木盆地；10. 青藏高原；11. 昆明盆地；12. 北部灣盆地北部平原（見圖 1.9）。

圖中可見，這些區域的共同點在於，都位於“波浪狀鑲嵌結構”的“波谷”位置，並且是東亞大陸上人口聚居最密集的区域。比如黃淮海平原以無與倫比的面積承載了東亞大陸最多的人口。即便那些諸如塔里木盆地、青藏高原的區域，也在某些地域供養了遠超該區域內平均水平的人口，比如塔里木盆地南北沙漠綠洲和位於青藏高原腹地的雅魯藏布江河谷。這些主要的地理區域外，東亞大陸東南沿海還有不少沖積形成的三角洲平原也在討論之列，較大的如長江下游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較小的則有韓江、晉江、閩江、甌江等沿海沖積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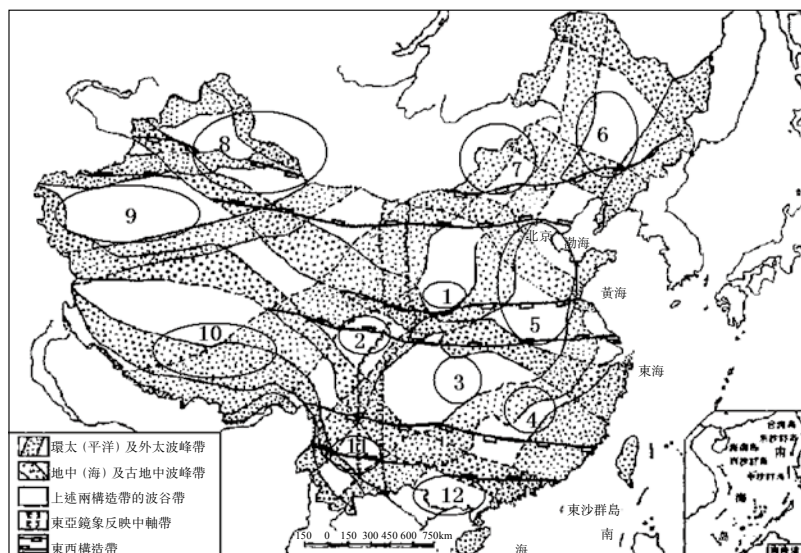


圖 1.9 東亞大陸主要區域

有了這樣一幅區域圖，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有些區域之間相鄰，有些不相鄰。根據相鄰區域會經由通道相連的原則，不相鄰區域之間，則會依靠共同分享的中間區域發生聯繫。比如，渭河谷地可以直接從武關道進入兩湖盆地——這是秦國攻楚郢的路線；從四川盆地東出，由舞水上的黔城關進入兩湖盆地——這是秦國司馬錯和張若先後攻楚黔中郡的路線^[16]。這樣，藉助區域和區域之間的聯繫（塞子），我們就能確定不同區域之間發生聯繫的固定路線，將區域和路線結合起來，就得出了圖 1.10“東亞大陸各主要區域聯繫圖”。

圖中除了我們之前通過圖 1.7、1.8 已經熟悉的路線外，還有許多首次出現的路線，將在本書後面的章節裡一一呈現。其中有四條路線值得我們先作一番考究，這四條路線就是被標有 A、B、C、D 字母和下劃線的路徑。

這四條路線，就是東亞大陸非常著名的四條“民族走廊”：A.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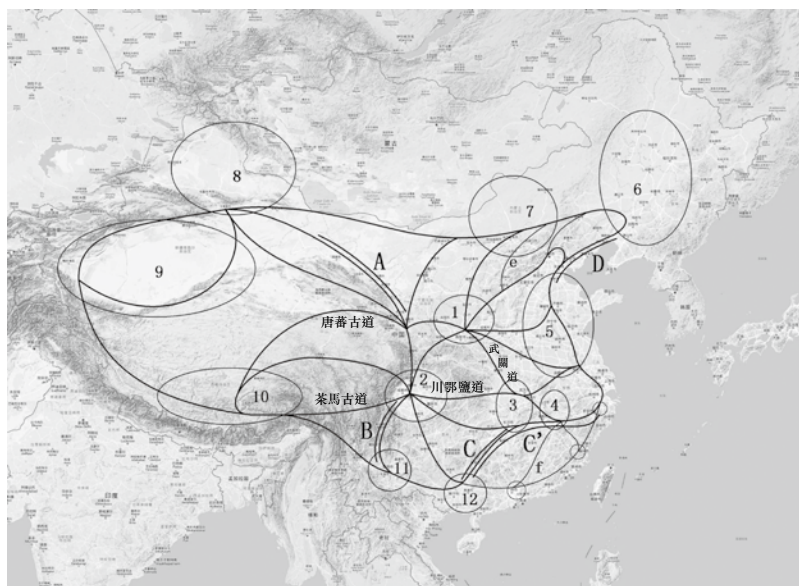


圖 1.10 東亞大陸各主要區域聯繫圖（小寫字母 e、f 分別代表了太行八陘和進入東南沿海三角洲平原的主要路徑）

西走廊（西北走廊）、B. 藏彝走廊、C. 南嶺走廊和 D. 遼西走廊^[17]。而且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四條比較容易識別的路徑（A 綿延於祁連山北麓，B 擁有大雪山的綿長峽谷，C 自古屬於湘桂通道，D 更是在明清易代時留下輝煌事跡），並非孤立於東亞大陸的某個固定（邊緣）區域。它們通過更大的構造網絡，與東亞大陸的腹地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比如遼西走廊向南的出入口並不中斷，而是分別和郟—廬斷裂帶的北端以及太行山斷裂帶相連，其在北部同樣沒有中斷，除了圖中顯示的沿赤峰—開原斷裂帶進入“（陰山）地理漏斗”外，該通道還繼續向北沿大興安嶺繼續延伸（見本書第七章）。

另外，為了便於後文中的討論，我們還可以重點了解一下連接 12—3—4 區域（北部灣盆地北部平原、兩湖盆地、鄱陽湖盆地）並一直延伸到黃淮海平原東南端的通道 C'。這條局部重合了（C）南嶺走廊的漫長通道，有一個構造地質學名稱——紹興—萍鄉—北海斷裂帶。它從北海開始，沿着柳州、桂林、永州方向，穿越洞庭湖平原的南部丘陵，在萍鄉和新餘之間穿過了分隔湘贛的羅霄山脈，經贛南丘陵與鄱陽湖平原的分野進入鷹潭、上饒。這條斷裂帶抵達浙西的江山後，分開了一條重要谷地，其寬處達數十公里（金[華]衢[州]盆地），狹處僅幾公里。入浙東後，名義上以杭州灣南部的紹甬平原作為終點，但以地表的延續性來說，還會繼續深入長江下游三角洲（並在通道結構中和郟—廬斷裂帶相連）。

圖 1.11 “華南變質岩和變質帶分佈示意圖”^[18]清晰顯示了紹興—萍鄉—北海斷裂帶的形成歷史^[19]。在東亞大陸上，這一構造不但聯繫了整個華南地區最主要的水系和平原（洞庭湖盆地、鄱陽湖盆地、金衢盆地），而且西接雲貴高原，東入黃淮海平原，承接了整個東亞大陸的南部，無愧於東亞大陸南部人群遷移“大動脈”的稱號。

回到“民族走廊”的話題，通過圖 1.10 和 1.11 的分析顯示：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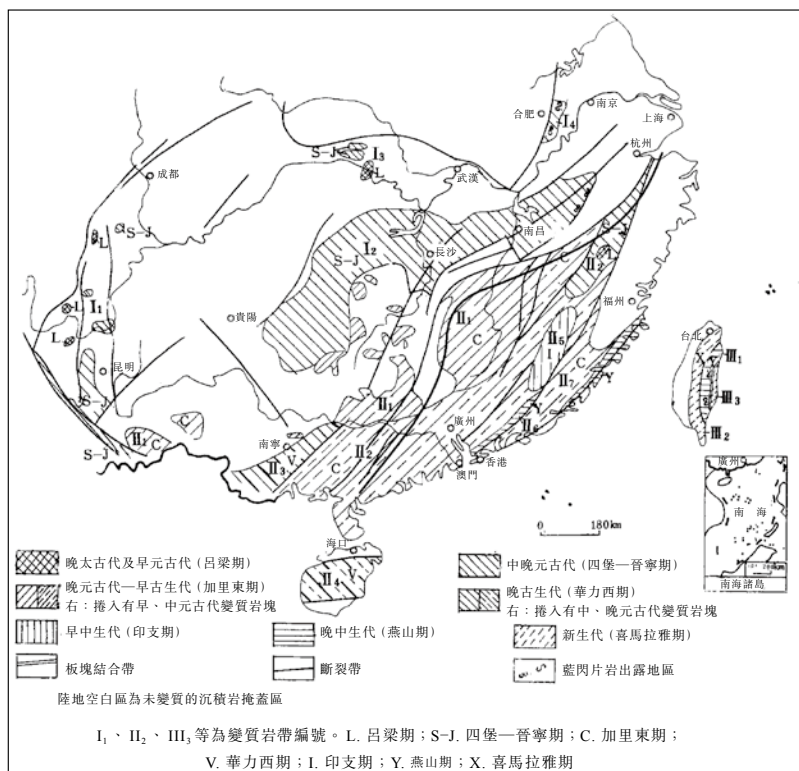


圖 1.11 華南變質岩和變質帶分佈示意圖 (圖中黑色粗線為作者所加)

四條著名的走廊並非僅僅屬於民族範疇；經由中亞大陸腹地的“通道”，它們不但接入了東亞大陸物質、人口流動的脈絡，而且將整個大陸連成了一張互動的網絡。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歷史上人類活動對地表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比如，湖泊淤塞、河流改道、農業活動對地貌的改變，但相對而言，由板塊構造決定的東亞大陸主要區域，以及區域之間聯繫的固定通道，要遠遠固定與持久得多^[20]。因此，我們可以把這一網絡視作一個恆定不變的參照系統，這一點成為本書研究的基礎。

大致描述完這些“不變”的參照系統之後（我們的最終目的顯然

不限於為東亞大陸繪製一張“交通圖”)，就可以在這一網絡體系中加入我們需要考察的變量——人類本身，理解地理與人的聯繫。

1.5 人類的旅行

東亞大陸“波浪狀鑲嵌結構”，幫助我們劃分了大陸的地理區域；山脈間形成的河谷路徑和構造斷裂帶，為我們標出了各個區域之間存在的通道。這些通道之所以有意義，並不僅僅是因為地質構造本身，更重要的是為人類（以及其他物種）在歷史時空中的活動、移動敷設了基本路徑，也為我們今天捕捉人類歷史上的活動軌跡提供了可能。一言以蔽之，通道因人類的活動而有意義。

首先，通道的空間為人類聚落的形成提供了物質基礎（河谷通道為農業文明的擴張，預設了發展場所）。其次，那些小至村落市鎮、大至通衢巨邑的聚落，無一不沿着通道分佈。這為我們了解早期人類的遷移，以及文明時代區域間的物質交換，提供了可能。第三，文明史之後出現的道路，同樣遵循通道的方向。聚落依地勢格局而建，道路為聚落之間溝通而設，那麼道路也反映了通道的趨勢（無論是早期的商路、郵路，還是晚近的鐵路、公路），都遵循着地理構造的方向——原因非常簡單易懂：道路需要避開險要，連接市邑。

這些與通道有關的特徵，一方面能幫助我們把握通道的準確位置（即便在特徵不太明顯的區域）；另一方面，也能揭開文化（人群）傳遞的具體方向，將物理空間和人類文化的分佈整合在一起。為了進一步闡述人類與通道的關聯，我們將在下面展開一次超越時空之旅，了解一下東亞大陸的境宇內存在過的那些（文化）人群。

按照圖 1.10 繪製的路徑，我們的旅行將從昆明盆地開始，不僅因為這裡是“東亞鏡像反映中軸帶”的最南端，而且也最接近“東亞人群南方起源”觀點^[21]的起點處。這就是古代文獻中滇越（侗台語

族)和烏蠻、白蠻(藏緬語族諸族)的故地。從這裡我們可以沿着西江上游的南盤江一路往東,經過百色、南寧,就進入了紹興—萍鄉—北海斷裂帶的南方起點。從廣西防城港開始,向東北面的欽州方向移動,柳州、桂林、衡陽、萍鄉、新餘、鷹潭、上饒、衢州、金華、紹興,這些聚落都是我們一路上需要經過的地點^[22]。

我們稍稍留意就會發現,這條通道其實貫穿了全部有文獻記載的越人區域:從西江上游雲之南的滇越,到黔南與廣西的駱越,洞庭湖平原長江中游的揚越,鄱陽湖平原的干越,西江下游的南越,通道以南沿海的東越和閩越,以及通道最東端出口的吳越。所有越人的主要聚落如同一串葡萄連在通道主幹的兩側,無怪乎“百越”^[23]。這個兼具地域多樣性與文化相似性的稱呼,可以指代東亞大陸南部絕大部分人群(見圖 1.12)。

從長江三角洲沿着後來大運河的方向向北(這是吳越伐齊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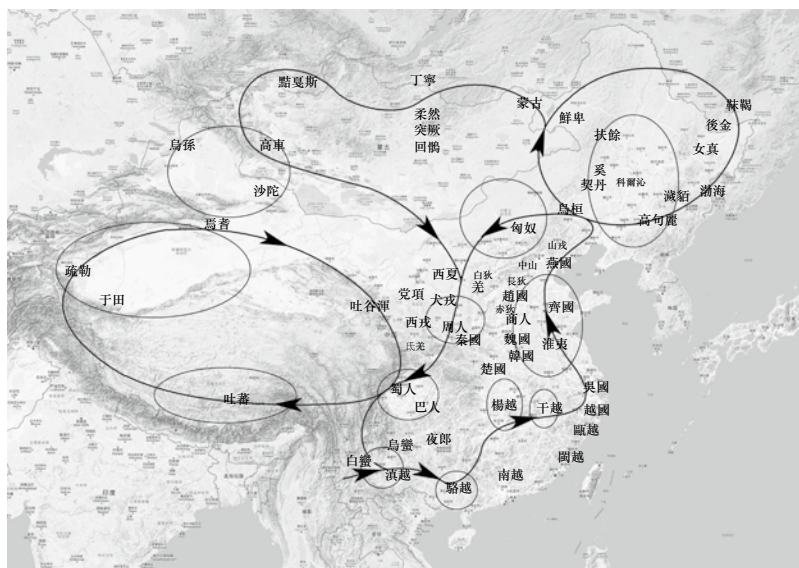


圖 1.12 東亞大陸主要人群(本圖包括但不限於本書將討論到的主要人群,人群的位置都以最早文獻記錄位置為起始點)

線)，會遇到淮河北部支流的淮夷。穿過齊魯大地，繼續向北，則遇到太行山東麓台地上的各種狄人，他們剛才經過太行山的陁徑進入平原。追隨燕國遷移的腳步，來到沿着海濱的遼西走廊——這條走廊將大平原的北端與遼河平原及更廣闊的東北平原連接在一起。

在遼西走廊最狹窄的地方，我們能看到史上最著名的“塞子”——山海關。在通道的北部，我們會遇到不同時段的人群，其中有早期的肅慎、扶餘，中期的高句麗、濊貊，後期的契丹、奚人，以及離我們很近的蒙古嫩科爾沁部落。

和他們相遇之後，我們面前出現兩條可供選擇的路線：第一條是繼續向北深入，在三江平原腹地乃至更北面直抵韃靼海峽的地方，我們能遭遇金人與女真這些通古斯諸族。而如果我們選擇了第二條路徑，沿着西遼河溯源便會發現，赤峰—開原斷裂帶將引導我們進入蒙古高原東部的草原與林地，在這裡便能與烏桓、匈奴等東蒙古的部落相會了。

沿着“地理漏斗”的東壁——大興安嶺的西坡北上，一路上遇到鮮卑人群並不令人意外，我們將在第六章裡看到他們從北方泰加林帶源源南遷。這個“漏斗”上方的廣闊區域，東起額爾古納河，西極額爾齊斯河，畛域極廣，跨越上千公里。當我們沿着蒙古高原北部的林地向西漫行時，鮮卑、北匈奴、丁零、蠕蠕/柔然、敕勒/高車、突厥、回鶻、黠戛斯，以及後來的蒙古諸部便一一出現在我們的視野當中。這些令南部人群百思不解而又常懷敬畏的群體，在歷史上始終不斷地對南部人群施加着固定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會沿着這個漏斗的東壁（大興安嶺西坡）或西壁（阿爾泰山東坡）向南移動，向地理漏斗的底部靠近。由於那些巨大構造的“縫隙”（塞子）的存在，將面臨眾多可供選擇的路徑。

如果我們選擇漏斗東壁南下，那麼可以觀察到，重要的太行山八陁會將人們送達大平原的西側和南側。我們看到，從山西的北部

開始，向農業轉型中亦耕亦牧的匈奴 / 鮮卑、狄人以及晉人依次有序排列，而太行東麓則是商人、狄人、趙人先後揮戈馳驅的世界。如果我們沿着“漏斗”的西壁向南移動，路徑就清晰了許多。順着阿爾泰山—陰山—泰山波峰帶，從賀蘭山南下，這裡不但屬於早期的羌人、周人，也屬於後來的鮮卑、党項。至於河西走廊這條渭水上游的路徑，則是西戎、秦人、月氏、吐谷渾向漏斗底部去來的必經之路。這條祁連山通道可以向南進入青藏高原東緣，也就是羌、氐生活的故地。

從漏斗底部的渭河谷地橫穿秦嶺進入南方盆地——巴人的土地——我們將與沿着岷江南下的人群匯合，順着龍門山南下，向雅安方向移動。在雅安這裡，出現兩條可供選擇的路徑：一條就是著名的“藏彝走廊”，沿着安寧河河谷，穿越東亞歷史上晚近形成的彝區，可以再次進入彩雲之南的世界；另一條路徑就要相對隱蔽許多，從雅安以西循着後世“茶馬古道”的鈴聲一路向西，出康定、理塘、林芝，這裡開始便是雅魯藏布江河谷兩岸農牧混合的地帶——喜馬拉雅山的腹地。這裡向北向東的諸條路徑又重新把青藏高原和東亞大陸的其他區域聯繫在一起。

在旅行的起點，我們結束了這場對東亞大陸古今人群並不全面的探訪。這證明那些著名的“走廊”並不孤立於東亞大陸的“邊緣”，而是同大陸腹地的通道一起，構成了東亞地區的聯繫之網。

此外，我們還領略了大陸古往今來主要人群的“風”俗“人”情。東亞大陸農業社會的文獻記錄者們習慣用“蠻夷戎狄”來稱呼不同方位的人群，這顯然與本書溝通腹地與“民族走廊”的宗旨不相吻合。我們從“旅行”中看到，東亞大陸的所有人群並不囿於某個具體的方位，他們可以經由“通道”在不同的地理單元中遷移，從而產生不同程度的“文化差異”。那麼，我們接下來要解答的一個問題就是：人群之間的這些差異是如何產生的？

1.6 文化的定義及其引理

當我們沿着東亞大陸的主要“通道”旅行時，可以發現那些人群在分類上——“蠻夷戎狄”——與方位相對應的特徵，比如，“北”和“狄”的固定搭配。但是，從上節可以看出，與其說這些分類體系應對了具體的方位，不如說，從根本上對應了東亞大陸由三大板塊拼接、構造的地理特徵。

通過“旅行”我們體驗到，東亞大陸南部較高的年降水在南方山地中形成了長江、珠江及其眾多支流在內的水系。正是這一環境特徵賦予了當地百越人群“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24]的獨特生活方式，我們通常把這種生活方式稱作百越人群的“文化”。

基於這樣一種對應關係，我們發現秦嶺—大別山構造帶以北地區所共享的“中原文化”，是一種建立在農業定居基礎上的生活方式；這種文化實際上與當地所處的平原農耕環境密切相關。同理，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遼西走廊以北、大興安嶺以東的“東夷/胡”文化，是建立在高緯度濱海林沼環境中的漁獵兼營農業的文化，濱海環境使得他們與蒙古高原以北遊動性更高也更依賴畜群的人群相比，更易於接受南方農業定居者傳遞的文化信息。

還有東亞大陸三大板塊之一——青藏高原（印度洋板塊）——所對應人群的文化。在這個獨特的體系中，海拔替代了緯度的作用。雖然藏北人群給我們的印象中不乏遊動性的一面，但在高原南部腹心，河谷農業同樣發達。值得一提的是，農業定居文化在青藏高原的腹地——雅魯藏布江流域河谷，具有壓倒性的地位，這實際上與大陸東部同緯度的川西農業文化高度一致。

“文化”概念對本書研究對象而言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可用一個類比來理解“文化”對人類的價值：當其他物種需要通過生物性適應來面對自然環境的變化時，人類卻能用“文化”來實現巨大的環境適

應。也就是說，人類毋需像其他物種那樣，在數百萬年的時間裡進化出厚厚的皮下脂肪或覆蓋全身的毛髮，而只需藉助植物（纖維織物）或動物（獸皮或獸毛）加工產品，便能實現向高緯度寒帶地區的拓張——用物質方式替代生物性方式，實現對環境的適應。

所有這些物質方式的總和，就是本書中使用的“文化”概念的主要內涵。環境的文化適應過程，會發生在人類生活的所有維度，包括但不限於食物獲取方式。其影響還體現在居住方式（類型）、交通方式（工具）等方面，所有這些都屬於文化的範疇。一言以蔽之，文化是環境適應的結果，是人類適應環境的一切物質與相應非物質方式的總和。就本書所討論的範圍而言，文化與地理空間上某一人群的映射關係最為顯著，同時也決定了不同區域內人群之間的差異。

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對這個引理的證明，得出一個初步結論：東亞大陸中部農業定居文化人群，對大陸其他區域人群有關“蠻夷戎狄”的分類，實際上是對不同人群在各自所處環境中所發展出獨特適應方式的感性認識（見圖 1.13）。正如農業定居文化在大陸中、東部所佔據的主導地位一樣，其他文化也是對該文化所流行地區的最佳適應方式。《禮記·王制》作者曾在二千五百多年前觀察到：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25]

通俗地說，遊牧文化是適應東亞大陸北部草原環境的最佳選擇，採集—狩獵文化（有些地區兼營農業）是東北亞林沼地區最適應的文化。由於文化的諸多要素中留給我們最直接的方面，往往是其與經濟方式（即生計類型）——獲得食物的方式——相關的層面，比如“遊牧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指“通過遊牧的方式適應草原環境



圖 1.13 東亞大陸主要人群聚類 (從圖中可以看到，人群聚類和構造區域之間的聯繫：這四個區域與東亞大陸三大構造板塊高度吻合，唯一的區別在於太平洋板塊被印度洋板塊隆起的天山—祁連山—秦嶺—大別山構造帶分割成南北兩個部分。)

來獲得食物，維持生計”，因此，我們也把遊牧文化基本等同於遊牧經濟／生計類型，以此類推。

文化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對不變的，比如匈奴、鮮卑、蒙古等人群及他們的後繼者都活動於蒙古高原這一相同區域，因而給我們留下近似的文化印象。但是，人群本身與地理構造單元之間的關係並非固定不變（著名的“人類非洲起源說”其實也是建立在這樣一種人類遷移擴散的基本認識之上）。因此，當蒙古高原北部居民們由於種種原因（後面章節會詳細提及）需要進行遷移時——在東亞大陸歷史記憶的刻板印象中，這些遷移毫無例外都是“南遷”——那些原有的文化方式將被引入另一種新的環境體系。新來者就會遭遇早已適應當地環境的原住居民。關於這種人群之間的遭遇，與其說這是一種不同族群的互動，不如說是不同環境適應方

式之間的遭遇。在本書中，我們稱之為“文化遭遇”。

當我們把“文化遭遇”這個概念，重新代入“文化是環境適應的結果”這樣一個句式，就很容易得出本書中另一條關鍵的引理：歷史（更確切說，即人類史）是文化遭遇的結果。這個觀點的證明更為簡便。以兩漢與匈奴的關係為例，當適應高緯度環境、遊動性較高的匈奴人群進入東亞中緯度農產區人群的視域之內，漢、匈之間的文化遭遇，本質上來自雙方所承載的環境適應方式的差異。這一切給雙方都造成了深遠的後果，經過幾個世紀的糾纏，兩者最終走向不同的方向，將難以估算的遺產留給了東亞大陸的繼承人們。從這個意義上說，漢、匈間文化遭遇的綿長過程，其實共同譜寫了公元前 2 世紀至公元 2 世紀東亞的歷史（見第五、六章）。

既然我們已經掌握了：（一）由東亞大陸地理構造造就的連接大陸各區域的通道，（二）分散在被緯度、海拔等環境因素塑造出的各區域內的主要人群，以及（三）人群對所在區域環境中的適應方式，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本書的主題，利用這些建立在自然史基礎上的知識，回答“人類史”上有關文化遭遇結果的問題。

1.7 建立人類遷移—互動模型

每個人群都有自己活動的區域，而遷移則使得不同區域人群之間不斷發生着互動。換句話說，文化遭遇始終都在發生。由於本書貫徹始終的任務，是揭示文化遭遇發生的原因和結果，在這裡我們就先引入一下研究文化遭遇的方法：人類遷移—互動模型。

我們在圖 1.10 中看到了東亞大陸人群主要生活的區域和區域之間的連接路徑，也在圖 1.12 和 1.13 中了解了東亞大陸人群聚類與地理構造之間的聯繫。我們暫且把每個具體區域中人群的“來龍”留給第七章來回答，先關注一下他們的“去脈”。因為從邏輯上講，按照東亞大陸的聯繫之網，一個區域內人群的“去向”，很可能是另一個